

基于公共文化空间的乡村景观建设探索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Based on Public Cultural Space

张剑飞 丁文鹏 李晶晶

ZHANG Jian-fei, DING Wen-peng, LI Jing-jing

摘要: 文化在不同发展趋势和发展境域的乡村建设中都扮演者重要角色。以公共性为核心属性的公共文化,为理解时代背景下乡村建设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以乡村文化的认知为基础,以公共文化作为乡村景观建设的思考切入点,以城郊融合类村庄为对象,提出了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风景园林学乡村建设的方法原型,并以三王村、前洋村2个案例来具体探讨实践过程中公共文化空间的应用。

关键词: 风景园林; 公共文化空间; 乡村景观; 城郊融合类村庄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641 (2021) 05-0016-04

收稿日期: 2020-12-25

修回日期: 2021-03-25

Abstract: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construction with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ends and situations. Public culture, with publicity as its core attribute, provide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e cognition of rural culture, taking public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ethod prototyp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rural construction that rebuild rural public cultural space and rural production, life and ecology space. And two cases of Sanwang Village and Qianyang Village are taken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practice.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ublic cultural space; Rural landscape; Suburban integrated villages

1 乡村的文化认知

在新冠疫情引发世界性公共危机的背景下,“小难避于城,大难避于乡”这句俗语似乎又悄然走到前台,将乡村社会之中国文化存续的丰富内涵,重新带回到日常的视野。乡村景观在时代发展大背景下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境遇:衰落和振兴。不论是因城市对乡村的“吸力”而导致乡村的衰落,还是因城市对乡村的“推力”而促使乡村的振兴,经济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助推剂。在经济影响的直接表象之下,人们也应当看到,城市吸力的核心是城市文明的发展对乡村生活的吸引力,城市推力的核心亦是基于乡村固有的文化异质性。没有差异化的乡村文化,就缺少城市推力介入乡村建设的前提和动力。因此,对乡村的文化认知成为时代背景下乡村建设重要的契入点。

文化包含诸多的内容,如哲学、文学、艺术、风俗等,就其层次而言

可以分为3个维度,即思想意识、文化实物、风俗习惯。张岱年先生将文化的定义抽象地概括为一切活动方式和活动成果,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演进^[1]。德国历史哲学家以“culture”指文化,强调“文化是活着的文明”^[2]。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文治和教化”两方面意思,彰显了文化之于社会的功用,突出了文化之于人的自身的改造。建国前的中国乡村是城市的载体,担负着人才培养、基层组织、经济输出的责任^[3],城市只是乡村“这张烙饼上的芝麻”;建国后的中国乡村在历次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始终扮演着消解矛盾、人力输出的“海绵”角色,为国家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乡村在这一进程中也逐渐退到了城市的“幕后”。不同的时代背景呼应了不同的社会治理与进步,对应了不同的文化演进与发展。生态文明时代的今天,强调山、水、林、田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同进步。乡村

的文化属性亦从以血缘为根本的家族关系,逐步演变为因生产力进步带来的以生产关系为根本的经济关系。以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的变革^[4],使乡村文化突破了传统家国二元层次的主流圈层,改变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5]。余秋雨先生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视公共空间的弱项^[6]在时代背景下更应被重视,构建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景观建设的有效切入点,是激活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的触媒,是生态时代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2 公共文化空间之于乡村景观

2.1 概念

公共文化空间是不同社会发展进程人际交往的纽带和载体:传统乡土中国的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社会表现

为具有代表意义的祠堂、宗社、庙宇等形式^[7]；当代乡村建设中公共文化空间的表达则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如村民活动中心、老年学堂、文化活动室、社区公园、电商服务站等。不同的乡村景观表达出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的文化特征。传统乡村景观的特征表现在小农经济的生产与生活，和乡土气质的审美与信仰两方面。前者是物质基础，是以农耕生产为基础的乡村聚落；后者是精神内核，表现为以实用生存为基础的自然审美和世俗信仰。而生态时代乡村景观的特征表现在共享经济的生产与生活，和时代气质的审美与信仰两方面。前者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技术进步与资源互补的产物；后者是文化自信所展示出来的传承与包容，是知行合一所体现出来的生活美学，是公共文化空间不同形式的表达。

2.2 公共文化与乡村景观

文化的表达最终都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得以传承。乡村景观亦如此，其物质层面表现为承载乡村生活所必需的各类场所与自然环境（比如房屋、宗祠、庙宇、耕地、水利灌溉设施、自然山水环境等），以及支持乡村生产所必需的各类工具；其非物质层面表现为乡村特有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验技术等^[7]。乡村景观所展示的物质与非物质的两个层面，在实际的乡村建设中互为彼此、相互影响。

公共文化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实施途径，肩负着发掘、重塑新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景观的任务。公共文化的基本属性是其公共性，既包含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的物质要素，也包括公共行为规范、公共精神认同等非物质要素。因此，以公共文化为支撑的公共文化空间，是具有公共认同、公共价值属性的物质与精神的复合体。如前所述，由于维系乡村社会关系核心要素的变化，乡村的景观构成亦发生了变化。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关系的转变，生产关系的转变也逐渐突破了传统乡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引力。经济关系消解了祠堂之于乡村在处理公共事务、落实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身份，代之以党、政机关的基层组织；同时，较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村社会，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现代乡村社会更需要具备共享、交流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作为乡村建设中文化传承、特色彰显的黏合剂，并与生产空间、

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三生”空间共同构建出新的乡村景观系统。

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使市场和效率成为乡村社会关注的核心要点，也由此引发了乡村社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系列变化。这种关注和变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乡村社会原本内容丰富的生产空间改造为功能单一的产品加工空间，不论这种产品是农业产品还是加工制造业产品；使原本内容丰富的生活空间转变为单调的以吃住为主的居住空间；使原本自然有趣的生态空间因单一功能、单一途径的目标导向，如防洪措施的挡墙式硬化处理，而丧失了其活力（表1）。鉴于此，笔者以城郊融合类村庄为对象，提出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乡村“三生”空间的景观策略，将传统乡村景观系统的孤立性扁平结构，转变为现代乡村景观系统的共享型网络结构（图1）。以地域性乡村景观的营造为目标，实现乡村对城市的吸力，进而实现城市对乡村的推力，最终成就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3 实践与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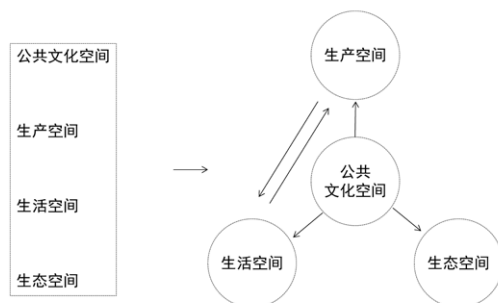
认知的维度决定了路径与方法的选择。乡村景观既是文化的呈现，也是文化导向的结果。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是当下城郊融合类村庄景观建设实践过程中的重要抓手，是塑造乡村景观地域特色的重要契入点；“三生”空间的重构是主动嫁接城市旅游消费需求与乡村旅游服务供给的重要“软件”。下文2个案例是笔者进行乡村景观思考与实践的有限经历，以求抛砖引玉。

3.1 乡关何处，从心出发

前洋村是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的一个行政村，距离市区约1h的车程；家庭人均年收入不到3万元人民币。毗邻省会城市的地缘优势并未对乡村的建设发展提供支撑与带动作用，相反，大城市广泛的就业机会吸引了村里大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这种情况导致乡村面貌呈现出以下特点：老宅只有逢年过节村民返乡之际才有人居住，平时常年户门紧闭，无人使用；留守乡村的常住人口以老年人和年幼的孩子为主；土地资源亦不时出现无

表1 乡村景观系统构成的特征比较

空间类型	传统乡村	现代乡村（城郊融合类）
公共文化空间	宗庙 / 祠堂 / 风水亭 / 宗教庙宇等	乡村客厅（村委会） / 景观亭廊 / 文化景观遗产
生产空间	耕地	耕地 / 民居
生活空间	民居	民居
生态空间	无制度约束的个体权属 / 富于自然的弹性生长	有制度保障的集体权属 / 缺少生态的活力延展



传统乡村景观系统的孤立型扁平结构 现代乡村景观系统的共享型网络结构

图1 乡村景观系统的结构模式

人耕种的情况。简而言之,空心化、老龄化、抛荒化是目前前洋村景观面貌的三大突出特征。

设计以乡村文脉的挖掘和提炼为切入点,着力城乡融合过程中人、地、资源的有机互动,力求创造可持续、有活力、在地性的乡村面貌,实现以公共文化空间为纽



图2 晚清闽东培田村总体格局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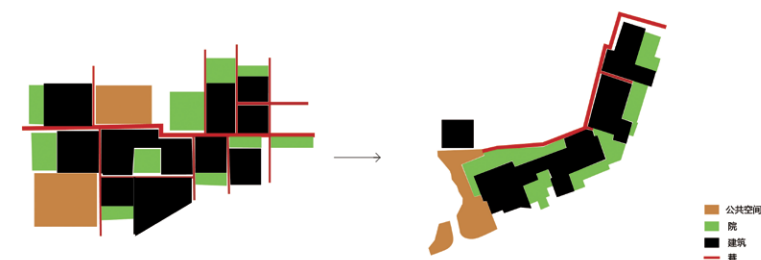


图3 前洋村民宿图底对蔡氏民居图底关系的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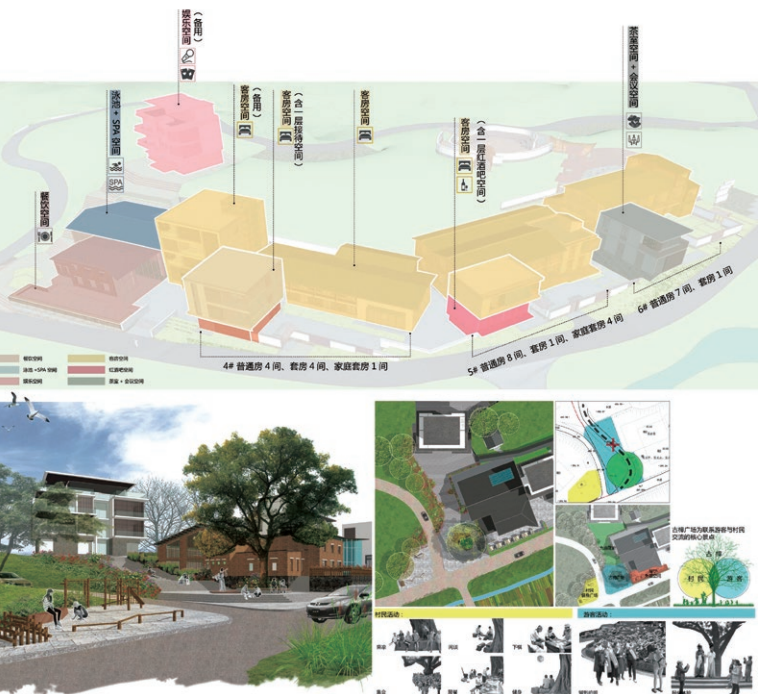


图4 民居、民宿、场所的共享

带,促进“三生”空间“一功多能”的角色转换,即吸取中国传统自给自足农村经济的“兼业”模式,打破现代化、单一经济的“产业”模式。因此,设计在总结了具有闽东传统村落代表性的培田村总体布局经验的基础上(图2),将常年闲置的村民老宅进行了合理的布局整合与居住单体的提质改造,共同构建出能够唤醒游客和村民乡愁记忆的自住与民宿相结合的乡村景观。对于常年闲置的几栋居民老宅,设计以福建闽东蔡氏民居建筑群落为原型,将其空间构成提炼为院、巷、园(图3);以场地现状的大树为原点,以度假酒家散点式布局为参考,提出功能统筹的构思,将酒店的前台接待、餐厅、多类型客房、红酒吧、茶室、步行廊道、室外篝火广场等功能元素因地制宜、依次展开,进行了场景化的串联(图4)。与此同时,将传统村落中的水口、祠堂以公共文化空间的角色定位,有机嵌入到总体布局之中。在农耕水系的生态利用方面,改变传统农业灌溉水利疏导的单一空间组织方式,将水的农业灌溉属性和景观观赏属性统筹起来,与自然山水环境共同构筑处“山环水绕点园林,前院后巷忆乡愁”的景观格局(图5)。

3.2 共享经济，文化助力

湖南省三王村位于张家界市慈利县,是大湘西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节点。以现有村部为核心,方圆 1.5 km 范围是历史上村民自发选择并建造的生活区,至今仍有近 40% 村民的宅基地、老屋、新建住房集中于此。居住房屋因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常年空置率较高。近 5 年来,到三王村进行踏青、溯溪等户外活动的游客逐年增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民的日常收入,以自住房改造而成的经营性饭店、旅馆等旅游服务设施已有 8 处。

设计提出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实践策略,对三王村现有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挖掘出三元宫遗址、土地庙祭拜场所等原生的、仍具有旅游价值的文化素材,并对其进行了适当的设计转译,创造出三元宫遗址公园“涵虚朗径”风景处等符合现代审美意象和乡村旅游形象的乡村生活文化场景。这种设计上的转译使村委会、土地庙、三元宫遗址等核心要素,变身为乡村客厅、涵虚朗径风景处、三元宫遗址公园三处各具特色、路径互补的公共文化空间,为村民与游客提供全方位的行政议事、日常休闲、旅游观光等服务(图6)。同时,设计提出以乡村集体合作经济的方式组建乡村文化旅游服务公司,将村民自住房的闲置房间入股集体企业,实现乡民变股民的身份转变,实现以乡村旅游经济促进乡村餐饮、住宿、农产品加工供应等多种产业互动的新局面的建立,促进乡村基础设施等景观面貌的进一步提升与改造,进而形成良性的乡村景观建设格局(图7)。这种以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三生”空间的重构为途径的乡村景观建设模式,改变了三王村原有的农业耕种、外出务工等单一的生产定式,主动嫁接了城市需求与乡村

资源,对土地、房屋、劳动力、农产品等生产资料进行了合理重置,多元化地激活了乡村的文化内生动力。这样的布局使传统乡村生活的记忆在时代背景下乡村景观建设中得到了巧妙的延续,彰显了三王村景观风貌的地域特色。

3.3 经验与探索

以家族本位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传统乡村文化,凝

结出祠堂、私塾等独具特色的公共空间,尽管这种公共属性大多数情况下只在家族内部开放。现代社会以生产关系的转变为契机,逐渐消解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家族壁垒,流通和交流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旋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集体经济组织架构起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因此,村民活动中心取代了祠堂成为日常交往的公共空间;传统乡村建设中极为常见的风水树、水口等要素也应当被保留并强化,突出其文化交流的公共属性;具有地方特色的“宗教凝结”“忠义礼信”“血脉信仰”等文化密码亦应当作为文化遗迹而被珍视、挖掘,通过适当的手法、途径转化成形式不一的公共空间。鉴于此,现代乡村景观建设以公共文化空间为纽带,将主导功能相对明确、使用对象相对单一的生产与生活空间进行了有机的组织,并统筹在生态空间的宏观背景中,逐步构建出新的乡村景观风貌。

4 结语

乡村建设作为时代背景下的热点话题,在不同经济状况的省份有不同的表达现状,需要面对来自政府、企业、村民等不同主体的诉求。如何综合而有效地平衡各方利益主体,同时做到可持续发展,是当下乡村建设需要正视的核心要义。笔者在深入思考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契入点,厘清建设各方的诉求,转变发展模式,实现村民作为乡村建设主、客体的角色转换,使其既是建设参与方,又是利益共享方,并以此强化各方主体的责任担当,实现内陆乡村建设在经济上的自我“造血”,在发展上的绿色生态。

注:图片均为作者自绘自摄。

参考文献:

- [1]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2] 夏欢.活着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浅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革命[J].商情,2011(7):13-19.
- [3] 许倬云.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 [4] 温铁军.乡村建设是避免经济危机的可能出路[J].小城镇建设,2017(3):6-10.
- [5] 余秋雨.中国文化课[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
- [6]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7] 汤辉,朱凯,陈君豪.文化校训空间视角下的近代岭南私家园林研究[J].广东园林,2019,41(6):9-13.
- [8] 王向荣.自然与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国土景观多样性[J].中国园林,2016,32(9):33-42.

作者简介:

张剑飞/1980年生/男/湖北人/在读博士/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丁文鹏/1978年生/男/湖南人/本科/湖南省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长沙410000)/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李晶晶/1985年生/女/湖南人/硕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410000)/讲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图5 前洋村景观设计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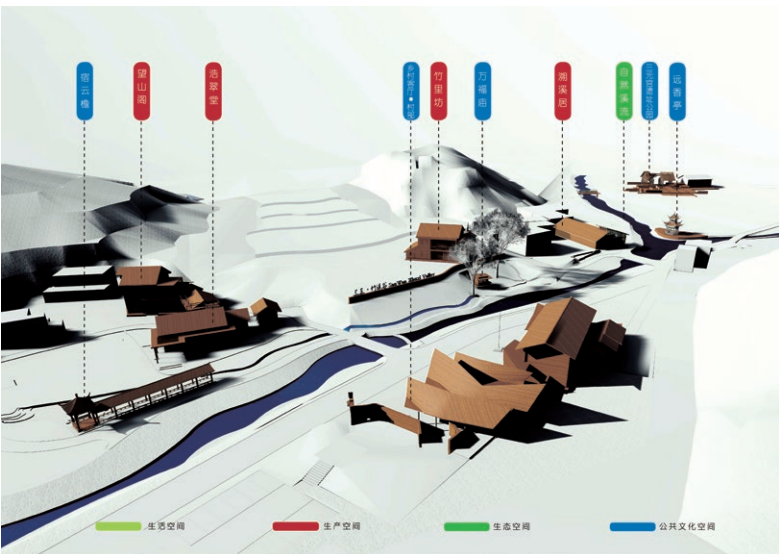


图6 三王村公共文化空间与“三生”空间



图7 建设前后的民宿对比